

段文杰对敦煌艺术史研究的贡献

穆纪光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中图分类号: K8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1)03-0026-02

段文杰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敦煌学大家,对敦煌艺术发展的各重要时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现仅就他在艺术史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以敬佩之心,做挂一漏万的回顾,以表达后学对先生深深的缅怀。

一 对十六国、北朝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发萌时期。研究该时期的敦煌艺术,要回答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段文杰对其中的许多问题都给予了回答。

(一) 用“种子说”对“西来说”的回应

在前人的研究中,“西来说”比较流行。段文杰提出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种子说”的辩证观点。

首先,他从线描的运用,说明敦煌艺术一开始就承传着中国的民族风格,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线,是在汉晋绘画线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他通过对敦煌飞天的分析,说明敦煌艺术对想象、联想和幻想的运用,正是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反映;第三,敦煌艺术中的雕像,无一不是用对“目”(眼睛)的描绘达到传神的目的。这种表现方法,同中国画论中所主张的“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顾恺之)等思想,有着文化根基上的联系。

(二) 对早期敦煌艺术发展阶段的划分

段文杰在研究敦煌早期艺术的阶段划分时,借鉴了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中对石窟分期排年的成果,对早期

敦煌艺术发展的四个阶段(“西域风格”、“中原风格”、“西域风格”与“中原风格”并存、“北周时代艺术的新风貌”)做了阐述。强调要以艺术风格的变化来探索艺术史的内在进程。

二 对唐代前期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

对唐代敦煌艺术的研究,是段文杰研究敦煌艺术史的重头部分。

(一) 敦煌艺术分期的多重标尺

在唐代,国运兴衰与艺术变化的同步现象非常明显。虽然如此,他在论述长达163年的前期敦煌艺术时,郑重地叙述了影响敦煌艺术发展的其他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他分析唐代敦煌艺术分期的多重标尺,这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1. 政治等因素。段文杰指出:“唐太宗李世民统治23年的贞观之治,为这个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嗣后又经武后和玄宗两朝的发展,国势乃臻于极盛。敦煌艺术史上的唐代前期,即大体相当于唐代的这一上升发展时期。”^[1]

2. 宗教因素。他指出:“敦煌莫高窟艺术的发展,不能不取决于佛教势力的增长状况。”^{[1]53} 释老两教的争斗;武则天登基后大造佛寺广度僧尼;众多高僧在敦煌弘扬佛法等等,都在段文杰对敦煌艺术发展的思考之列。

3. 外来文化因素。他指出:“唐代前期的敦煌艺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中印度笈多王朝艺术的影响

响,其表现在菩萨像的装束、姿态以及表现形体凹凸的晕染方法上。”^{[1]69}

4. 中原文化因素。他指出,自隋代统一中国之后,中原文化对敦煌石窟的艺术创作的影响与日俱增,唐代更甚。以吴道子为代表的画家与以杨惠之为代表的雕塑家的画技及艺术风格,以中原画稿不断传到敦煌为媒介,深深影响了许多无名匠师在敦煌诸佛寺的绘画和雕塑创作。

5. 世俗生活的因素。他指出,敦煌民间艺术家在表现宗教内容的同时,还在努力挖掘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这种表现,在唐代前期的供养人画像中尤为显著^{[1]66}。

(二) 从艺术角度对敦煌艺术个性的分析

段文杰从五个方面对唐代敦煌艺术的鲜明个性进行了分析。

首先,造型方面。他指出,唐代雕塑和绘画趋于写实,比例适度、面相丰腴、具有庄严沉静的造型特点。敦煌石窟艺术的人物造型(尤其菩萨造型),同当时的世俗风尚极为一致。

第二,构图方面。他指出,唐代前期敦煌艺术中巨型经变的构图形式,从小到大,从简至繁,从一品到多品,形成了完整统一的巨型结构。

第三,线描方面。他指出,敦煌的唐代画师善于掌握毛笔的性能。落笔快时,造成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运笔徐缓时,描绘出凝重细微的形象。

第四,赋彩方面。他指出,唐代壁画色彩极为丰富,采用了叠晕和渲染的方法。早期来自西域和中原的这两种染色法,在唐代得到创新,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表现方法。

第五,传神方面。他通过对莫高窟中凝神默想、内心澄明的思维菩萨(莫高窟第71窟),像少女般欢快的赴会菩萨(第321窟),姿态婀娜、眉目似笑非笑的第45窟菩萨,庄静温婉的第194窟菩萨等的分析,说明唐前期的敦煌造型艺术在传神表达上,达到非常高的境界,刻画了大量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1]74}。

三 对唐代后期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

段文杰指出,唐后期(中唐、晚唐)的敦煌艺术,

已无法同前期相比,但精致秀丽的吐蕃中期壁画,仍有超越之作。在大型人物塑造上,第158窟的《涅槃变》,其笔力之雄健,神采之昂扬,对前期的规范仍有所突破^[2]。

唐后期张议潮时期的壁画,意境贫乏,经变结构已趋公式化,但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却是例外,是前所未有的上乘佳品^{[2]97}。

四 对晚期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

段文杰所指晚期的敦煌石窟艺术,包括五代、宋、西夏、元四个时代的作品。晚期敦煌艺术分为两个阶段:曹氏画院时期和少数民族政权时期。

段文杰认为,五代开始的曹氏画院,以新题材创造了诸如《刘萨诃变相》、《五台山图》、《新样文殊》等作品,表现了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以及和儒、道思想相结合的过程,但是构图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公式化日趋明显,榜题增多,画面支离破碎,艺术境界已现苍白^[3]。

党项族统治时期的西夏壁画,他认为,其内容更趋贫乏,但其线描,尚继承了曹氏画院的兰叶描,又接受了中原挺拔有力的折芦描,使之有所发展^{[3]123}。

蒙古族政权时期的元代壁画,由于接受了从西藏传来的萨迦派密教艺术的影响,出现了新的风格:线描被推到极高水平;具有中原画风的壁画,设色清淡典雅;有萨迦派藏密艺术风格的第465窟,色彩浓重鲜明,有种令人怖畏的美艳,艺术效果非常强烈。他指出,元代为数不多的精湛作品,已是敦煌艺术的“尾声”^{[3]123-124}。

参考文献:

- [1] 段文杰. 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G]// 段文杰. 敦煌石窟艺术研究.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53.
- [2] 段文杰. 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G]// 段文杰. 敦煌石窟艺术研究.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97.
- [3] 段文杰. 晚期的莫高窟艺术[G]// 段文杰. 敦煌石窟艺术研究.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122-123.